

從和戎到拓邊—— 北宋中期對外政策的轉折

方震華*

北宋在真宗簽訂澶淵之盟後，防禦與和議成為處理對外關係的主軸。到了神宗時代，對外政策產生明顯轉變，宋軍發動一連串的拓邊戰爭。神宗身故後軍事行動雖告停止，但隨後又由哲、徽兩帝持續推動。本文分析真宗至神宗時期宋代文士的言論和著作，指出此一轉變是文官群經過長期的蘊釀的結果。主要的原因在於，澶淵之盟所帶來的承平，並未使士人放棄追求邊功、恢復故土的理想，西夏的入侵又顯示和戎政策的失敗。儘管宋、夏在慶曆年間重新達成和議，范仲淹和同道仍以「復漢唐舊土」為由，提倡拓境的計畫，加上士人研習兵學的風氣持續，都為主戰意見的發展提供動力。隨著仁、英兩朝西部與南部邊境持續的軍事衝突，官員陸續提出進擊西夏和交趾的主張，終因神宗的支持而得以落實。神宗朝的主戰官員不僅在策略上承襲仁宗時期以來的主張，也同樣以恢復故土來合理化自己的訴求，顯示漢、唐的典範對於北宋外交政策與政治論述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是吸引士人投入軍旅之事的重要動力。

關鍵詞：宋神宗、拓邊、主戰、對外政策、范仲淹、韓琦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北宋與外族簽約締和的歷史一直是現代史學家關注的議題，對於宋代文官為合理化「和戎」政策而提出的弭兵反戰論點，前輩學者已有深入的分析。這些研究指出北宋文臣多半反對與外族作戰，經常提出和戎弭兵的主張，以壓抑君主拓邊的野心，成為宋代政治文化的一項特色。在真宗簽訂澶淵之盟之後，防禦與安撫成為處理對外關係的基本原則，弭兵論的主張得以落實。¹但是，這種狀況在神宗朝開始轉變，宋軍發動一連串的對外拓邊行動，直到神宗身故才告暫停，但隨後又在哲、徽兩朝持續進行。這些軍事行動集中於西部與南部邊境，雖然並未導致北宋完全改變與外族政權的關係，仍引發極大的爭議，並成為影響北宋晚期政治局勢的重要因素。²

為何弭兵和戎的政策會發生改變？長期以來，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被指為關鍵人物。例如元豐八年(1085)神宗去世後，司馬光(1019-1086)上奏指出：宋太祖(927-976，960-976在位)、太宗(939-997，976-997在位)在平定天下之後，不再對外族用兵，一意與民休息，所產生的成果可謂

¹ 關於此一議題，學界已有不少的討論，參見陳芳明，〈宋初弭兵論的檢討(960-1004)〉，頁 47-64；王明蓀，〈宋初的反戰論〉，頁 37-52；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29-39；陳峰，〈宋代主流意識支配下的戰爭觀〉，頁 38-50。

² 對於神宗朝以降的拓邊行動，至今尚無完整的討論，僅有部分研究觸及相關的事件或人物，參閱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黃寬重，〈北宋晚期對廣西的經略——以程節、程鄰父子為中心的討論〉，頁 208-225；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91-103；湯佩津，〈北宋的南邊政策——以交趾為中心〉，頁 140-222；Paul Smith, "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 (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 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s, 1068-1126," pp. 78-130.

是「太平之極致」。神宗「材雄氣英」，以疆域不及漢、唐為恥，導致文、武臣僚爭相獻策拓邊，開啟戰端，造成國家極大的危害。³此種將對外政策轉向歸因於君主恢復漢唐疆土野心的論點，在當時頗為常見，也影響到後世的史論。⁴但是，只強調君主決策的影響，不免使人以為北宋對外政策在神宗即位後突然由和轉戰，而未能呈現其中的曲折。對此，曾瑞龍首先提出修正，指出神宗朝以降的拓境行動在仁宗時期已見端倪，可以由慶曆年間修築水洛城的過程看出。由於陝西地區的武將和豪俠之士熱衷於開疆拓土，透過眾人持續努力，終能突破宋初以來「弭兵論」的桎梏，成功地開拓水洛城作為軍事基地。⁵此論點不僅突顯了邊區武人在拓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顯示對外政策的轉向有一段發展過程，因而甚具意義。在宋代文獻中，的確可以看到將神宗朝開邊之議歸咎於陝西地區武官的說法。最受批評的是种諤(1017-1083)，甚至有「諤不死，邊事不已」的說法。⁶不過，在真宗朝以降的政治運作中，文、武官分途，外交、軍事的重大決策由文官主導，武臣比較缺乏影響力的相關史實，學者已多所論述。⁷在對外

³ 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3，元豐八年十二月，頁 8690。以下均簡稱《長編》。

⁴ 元代編成的《宋史》即說：「神宗奮英特之資，乘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平靈、夏，而蔡挺、王韶、章綏輩起諸生，委褒衣，樹勳戎馬間。世非無材，顧上所趣尚磨厲奚如耳。」將當時文臣主戰的風氣歸因於神宗個人意志使然。見脫脫等編，《宋史》，卷 328，〈章綏傳〉，頁 10592。

⁵ 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頁 15-44。

⁶ 《長編》，卷 334，元豐六年四月，頁 8047。關於种諤生平的研究，參見曾瑞龍，《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頁 89-97。

⁷ 參見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頁 77-79；陳峰，《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頁 124-146、277-302；Cheng-Hua Fang,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 875-1063)*, pp. 129-161.

和戰的問題上，若無文官支持，不僅武官難有表現，皇帝的意志也不易實現。以神宗委以拓邊之任的官員而言，固然有武臣、宦官，但文臣實居主體。其後哲宗(1077-1100，1085-1100在位)承繼父志，致力用兵西夏，仍然倚重文臣來經營。正因如此，吏部侍郎張舜民才會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上奏徽宗(1082-1135，1100-1126在位)，批評神宗朝以來的主戰官員根本是一群不諳邊事的「江湖書生」。⁸由此可見，在注意武官之外，更應重視文官對於拓邊工作的投入，才能對於北宋對外政策的轉向有更清楚的理解。

另一方面，司馬光指出北宋的疆域不及漢、唐是引發神宗開邊的主因，反映出「復漢唐舊境」的理想與對外政策的轉變有密切的關係，同樣值得注意。宋代君臣身居漢、唐之後，很難漠視前朝的治理成就與典範。自宋初以來，恢復漢、唐舊土，就成為支持拓邊戰爭的常見理由。例如：太宗在雍熙北伐失敗後，回應趙普(922-992)的批評，即以「俾契丹之黨遠遁沙漠，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強調自己並非窮兵黷武之君，用兵只是為恢復故土。⁹王禹偁(954-1001)在端拱二年(989)上奏太宗時也說：「頃歲弔伐燕薊，蓋以本是漢疆，晉朝以來，方入戎地，既四海一統，誠宜取之。」¹⁰可見，恢復前朝疆土在宋初君臣看來具有很高的正當性。澶淵之盟後，主政者放棄北伐之念，不再提倡此種論點，但其影響顯然沒有消失。儘管在北宋文人的議論或文章中，曾經出現批判漢、唐對外政策的意見，或是強調宋與外族關係有異於漢、唐；但前代的典範對於宋代的外交政策與政

⁸ 張舜民，〈上徽宗論進築非便〉，收入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140，頁1585。

⁹ 《長編》，卷27，雍熙三年五月，頁617。

¹⁰ 《長編》，卷30，端拱二年正月，頁672。

治論述有重大的影響，是我們分析北宋政治時應留意的面相。¹¹長期以來，學界著重研究和分析宋代的弭兵反戰言論，相對忽視拓邊主戰的意見，對於此種立場產生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亦缺乏分析。本文透過討論北宋對外政策的轉變過程，希望能對北宋的政治和士人文化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二、承平時代的矛盾

景德元年(1004)，宋、遼簽訂澶淵之盟是劃時代的大事。自唐末以來，契丹政權與中原王朝間長期的軍事衝突，至此終告結束；北宋統治者接受疆域現狀，放棄北伐之念，也代表宋初以來提倡弭兵反戰論者的勝利。以歲幣換取和平，奠定了安定的大環境，有利於經濟與文教的发展。在和約簽訂後的第四年，北宋君臣們開始宣揚「已致太平」的論點，日後遂有各種封禪告天，歌舞昇平之舉。¹²隨著承平時間的延長，對許多活躍於仁宗朝的文臣而言，他們的成長歷程是「目不識干戈之事，耳不聞金革之聲。」¹³戰亂與兵禍的消聲匿跡，成為他們自覺本朝超越前代的傲人成就。例如：石介(1005-1045)於仁宗寶元元年(1038)編成《三朝聖政錄》的序文中，主張本朝於真宗時期完成太平之業，其成就之大，「可謂跨唐而逾漢，駕商、周而登虞、夏者」。¹⁴可見，他想藉著書寫太祖至真宗的政事，宣揚宋是一個跨越三代、漢唐，

¹¹ 參見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頁13-14、126-128、199-202。

¹² 《長編》，卷68，大中祥符元年三月，頁1528-1529。關於真宗君臣致力於封禪的意義，參見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頁126-141。

¹³ 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8，〈三朝聖政錄序〉，頁209。據陳植鐸考證，本文作於仁宗寶元元年(1038)，宋與西夏尚未開戰，見陳植鐸，《石介事跡著作編年》，頁82-83。

¹⁴ 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8，〈三朝聖政錄序〉，頁209。

與堯舜盛世相媲美的偉大王朝。

不過，儘管石介以誇張的筆法頌揚宋初諸帝「致太平」的成就，對他而言，生長於承平時代之，卻仍有遺憾。他在景祐四年(1037)寫〈鄆城縣新堤記〉時說：

太祖、太宗用武，當是時，武夫帶一刀，負一矢，取功名如山岳；書生吐一奇，運一策，闢土地數千里。聖主勳臣，勞告天地宗廟，外內文士，得取為歌、詩、頌、讚，刻于金石，播諸筦絃。……真宗以文守，陛下以孝治，通五十六年，生物鬯遂，積穀豐實，海內恬嬉聞暇，習於俎豆，寬儒蘊藉，尚以章句。武夫、書生，莫得如向之取功名、闢土地者。學史者磨石濡毫，俟以歲月，竟無有卓卓勳烈，可稱紀載。夏四月，予卧睢陽公舍，鄆城縣令劉君準遣使致書于予，曰：「故鄆城為水濕敗，……於是環城築長堤千九百步，高二十尺，厚九尺，足以捍城矣，足以禦水矣。……太平為吏，不從軍邊塞，效萬死一生，立尺寸功，求榮名書國史；此為績雖細，猶愈夫坐而視民溺死不救者焉！」¹⁵

顯然，石介與鄆城令劉準都認為，在太平之世為官，無法在邊境立下戰功，以致於能夠成就的事功與王朝肇始之初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不禁產生了一種無事可做、無功可紀的苦悶。由此看來，軍功的價值並未因長期承平而被文士忽略，反而因為軍事成就的難以企及，變得更加令人嚮往。

正因在價值觀念上視軍功為可頌、可記之事，石介一方面稱頌宋初諸帝的貢獻在於「致太平」，一方面則讚美他們克敵制勝的武功。他在寶元元年寫《宋頌九首》，序言中所稱頌的「盛德大業」，全是軍事成就：

¹⁵ 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 19，〈鄆城縣新堤記〉，頁 232-234。

我國家太祖武皇帝，一駕而下澤潞，再矢而定維揚，三揖而納荆、潭，四指而收蜀、廣，五征而平江南。太宗文皇帝，克紹前烈，亦既踐祚，南致淮、海數十州之地；纔謀順動，北縛并元四十五年之寇。真宗章聖皇帝，暫臨澶淵，匈奴喪威墮膽，迄今四十年，樂我盟好，不敢箠馬而南。¹⁶

由此看來，宋初諸帝之所以能成就太平之業，在於掃平四方僭偽，並威服夷狄。這種對先帝軍事成就的稱頌，迥異於弭兵論者提倡藉由道德感召使夷狄屈服的理念。故石介所塑造的本朝成就，顯然偏重在武功的層面而非德治與文教。

在頌揚皇帝的軍事成就之餘，石介同樣景仰兼有文、武兩種政治表現的官員，活躍於太宗朝的柳開(947-1000)就受到很高的推崇：

堂堂柳先生，生下如猛虎。十三斷賊指，聞者皆震怖。十七著野史，才俊凌遷固。二十補亡書，辭深續堯禹。六經皆自曉，不看注與疏。述作慕仲淹，文章肩韓愈。下唐二百年，先生固獨步。……貔貅十萬師，盟津直北渡。塞上諸猛將，低頭若首鼠。渴憶海為漿，饑思鰲為脯。兩手拏人肝，大牀橫斗肚。一飲酒一石，賊來不怕懼。帳下立孫吳，罇前坐伊呂。笑談韜鈴間，出入經綸務。匈奴恨未滅，獻策言可虜。幽州恨未復，上書言可取。好文有太宗，好武有太祖。先生文武具，命兮竟不遇。死來三十載，荒草蓋墳墓。四海無英雄，斯文失宗主。豎子敢顛狂，黠戎敢慢侮。¹⁷

石介認為柳開的史才凌駕司馬遷與班固，在文章上可與王通(字仲淹，584-617)、韓愈(768-824)相比，是近兩百年少見的人物；而其軍事素養與

¹⁶ 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1，〈宋頌九首并序〉，頁2。

¹⁷ 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2，〈過魏東郊〉，頁20-21。

表現，亦為武人所畏服。如此才兼文武，卻無法得到施展長才的機會，導致中國在學術上失去真正的領袖，外夷至今仍然狂狷不馴。對石介而言，柳開事蹟中最令人感傷的是在知寧邊軍時交結北方的豪族白萬德，計畫奪取幽州，卻因調任知全州而不克實現。他曾作〈感事〉詩記述此事，在詩末說：「事成已有萌，侯去何云亟。豪傑夜空回，帳中屢嘆息。我覽此二事，天意終難測。撫卷一感傷，兩眼淚潛滴。」¹⁸將此事的不克實現歸之於天意，流露出對於幽州未復的無限感慨。

揆諸宋、遼情勢，石介對於柳開的推崇實有其不切實際之處。太宗兩次揮軍北伐，企圖奪取幽燕，一開始都是進展順利，但最後無功而返，可見契丹政權對幽燕地區的控制十分穩固。¹⁹柳開想靠召納當地的豪族來收復幽燕，成功機率恐怕很低。由此看來，生長於太平歲月的石介未免把恢復幽燕看得太容易了。不過，這種態度在當時並非石介獨有，蘇舜欽(1008-1048)曾寫〈蜀士〉詩，記錄一位來自於四川賈姓「怪士」的事跡。此人至京城上書執政，自言在承平之時，無人重視軍事，唯自己精通兵書，可以「掉舌滅西寇，畫地收幽燕。」但先後三次上書，主政者都不為所動，只能黯然返鄉。²⁰可見，在承平的大環境中，仍有一批文士認為自己擅長軍事，足以解決邊患、收復故土，期待建立軍功的機會，只是他們的訴求並不受到重視。張方平(1007-1091)在天聖八年為友人古卞所寫的序文中也提到相同現象：

自石晉割我幽、薊，以自濟於禍難，而冀方之地，乃戎夏共處。

¹⁸ 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3，〈感事〉，頁24-25。關於柳開企圖交結幽州豪傑一事的相關記載，參見伍伯常，〈北宋初年的北方文士與豪俠——以柳開的事功及作風形象為中心〉，頁320-321。

¹⁹ 關於太宗發動的兩次北伐戰爭，相關研究頗多，最詳盡的是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

²⁰ 蘇舜欽，《蘇舜欽集》，卷1，〈蜀士〉，頁8。

國家用文德懷遠，以交好息民，于今三紀，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戰。公卿士人，恥言兵事。子常何哉，獨留意於孫、吳家也？噫！誠得將如李牧輩，朝廷能盡其用，廟堂之上，智者謀之。復山北之地，雪中原百年之恥，係呼韓邪之頸，縻致闕下，使歲時貢賀，如漢宣帝時，子行觀之，其易難也？……惟我知子天下奇士，汗漫之伎無所施爾。酒酣日下，駕而將行，聊歌一引，以起其倦游之意云：夷夏不敵兮，乃古其然。中國大恥兮，有石之遷。……念頗、牧之無所用兮，吁嗟奈何！感子征兮，永歌。²¹

張方平雖然肯定和戎政策帶來三十年的太平歲月，卻仍視契丹占有幽薊之地為「中原百年之恥」，期待有朝一日主政者能夠重用良將，像漢宣帝(91-49 BC, 74-49 BC 在位)一樣使外敵俯首稱臣。但是，以當時主政者避談兵事的傾向，即使有良將如廉頗、李牧，亦難發揮長才。

石介等人的著作與言行，不僅代表了和平時代士人對於建立邊功的浪漫憧憬，也反映了他們對當時華夷關係的不滿。相對地，另一批文官同樣重視軍事，但對現狀的擔憂卻不在於舊疆未復，而在於潛藏的邊防危機，范仲淹(989-1052)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天聖三年(1025)的上奏中提出警告：

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伏望聖慈，鑑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

²¹ 張方平，《樂全先生文集》，卷34，〈送古下北遊序〉，頁156。

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鬪之間，拔卒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²² 仲淹雖未提出恢復舊疆的主張，但顯然對和議所造成的結果感到不安。他認為長期和平的環境導致國家輕視武備，人民缺乏軍事經驗；一旦爆發軍事危機，倉卒之間勢必起用士卒為將帥，將使五代時期軍人擅權之禍再臨。因此，范仲淹認為國家的發展應文、武並重，重視軍事人才的選拔及邊職的派任。

除了范仲淹，仁宗朝初期，上書呼籲朝廷重視邊境潛藏危機的文官，還有「好讀兵書」的楊偕(980-1049)，「以氣自豪」的石延年(994-1041)，及慶州通判景泰。²³此外，著名詩人梅堯臣(1002-1060)在西夏戰爭爆發前為《孫子》作注，上呈朝廷，其用心也在防止「天下忘戰」之弊。²⁴這些事例都顯示出年輕、資淺的文士和官僚對於軍事的重視，以及對當時夷、夏關係的不滿。然而，主政者皆不為所動。富弼(1004-1083)在慶曆四年(1044)的奏書中，回顧澶淵議和後的政治氣氛是：「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搢紳慮患者謂之迂濶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²⁵不過，當元昊於寶元元年年底發兵侵宋後，迴避邊事的風氣隨即發生改變。

²²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9，〈奏上時務書〉，頁201-202。

²³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29，〈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頁440；卷24，〈石曼卿墓表〉，頁373-374。《宋史》，卷326，〈景泰傳〉，頁10517。

²⁴ 梅堯臣字聖俞，據劉敞的記載：「昔者邊鄙無事，士大夫恥言兵，聖俞獨先注孫子十三篇獻之，可謂知權矣。及其有事，士大夫爭言兵，或因以取富貴，聖俞更閉匿，不省利害，可謂知道矣。夫聖俞前非勇也，知天下忘戰之必有憂也。」可見梅堯臣為《孫子》作注，目的在提醒朝廷「忘戰」的危險性。參見劉敞，《公是集》，卷35，〈送梅聖俞序〉，頁3。

²⁵ 富弼，〈上仁宗河北守禦十三策〉，收入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135，頁1501。

三、主戰或主和的爭議

西夏的入侵促使北宋的文官與士人重新思考軍事議題，主持對夏戰事的韓琦(1008-1075)在慶曆元年(1041)上奏說：「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於上。」²⁶可見，談論邊防事務成為一時風尚，促成兵學的發展。但是，「人持所見」產生的結果是對應敵策略的爭論不休，甚至同一人的主張亦可能前後相異。像是范仲淹在和、戰立場上的改變就很得注意，因為他既是主持對夏作戰的重要官員，又在士人群體中擁有極高聲望，因而深具影響力。

范仲淹於康定元年(1040)受命至陝西參與軍務，當時有邊臣提議五路出兵進討元昊，仲淹認為「中原無宿將、精兵」，上奏反對進兵。²⁷次年正月，朝廷決定採行韓琦進討的計畫，由涇原、鄜延兩路出兵，但統轄鄜延路部隊的范仲淹仍堅持招撫元昊，而拒絕派兵配合作戰。等到韓琦所遣的部隊兵敗好水川，范仲淹也因擅自致書元昊議和而飽受批評，甚至有執政大臣主張將其處死，最終遭到貶官。²⁸但是，仲淹仍致書體量安撫使王堯臣(1003-1058)，力主把握機會和談：

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卻行招納？國威愈屈，為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將之恥，必加討伐，苟得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尚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為國家之羞。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困弊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衰，羣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累朝欲刷大恥，終無成功。真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天下景福四十年矣。今按

²⁶ 《長編》，卷 133，慶曆元年九月，頁 3176。

²⁷ 范仲淹時任陝西都轉運使，見《長編》，卷 127，康定元年五月，頁 3013。

²⁸ 《長編》，卷 131，慶曆元年四月，頁 3114。

《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明主矣。²⁹就仲淹所見，當時缺乏像漢代段熲、唐代李靖(571-649)之類的將才，因而無法在軍事上取勝。此外，秦、漢時代征討四夷，使中國困弊的殷鑑不遠，必須以真宗澶淵之盟為典範，謀求和談罷兵。對照他在天聖三年及康定元年上書的內容，仲淹對於本朝將帥人才不足的憂慮可說是一貫的，也使得他力主對西夏罷兵議和。

在范仲淹看來，澶淵之盟利用金錢化解軍事衝突，正是以中國所具有的優勢對付夷狄所擅長的武力。他在慶曆二年(1042)正月再度請求仁宗派人與西夏交涉和約，提出的理由就是：

且自古兵馬精勁，西戎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術也。

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餘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³⁰

由於中國無法以軍力壓制西夏，也無法訴諸道德予以感化，最後只能依靠經濟的優勢。挪用國家稅收中的一小部分來換取和平，可以避免持續的戰爭帶來全國性的傷害。不過，朝廷一直不接受仲淹議和的建議，也不讓他解除環慶路經略安撫使之職。³¹隨著在陝西統兵時間的增長，仲淹自覺整軍有成，對宋軍戰鬥能力的信心增強，使得他在和戰的立場上有所轉變。

慶曆三年(1043)年初，元昊突然派遣使者至汴京求和，主持邊務的

29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 10，〈答安撫王內翰書〉，頁 251。王堯臣於慶曆元年正月受命至陝西「體量安撫」，見《長編》，卷 130，慶曆元年正月，頁 3083。

30 《長編》，卷 135，慶曆二年正月，頁 3218。

31 慶曆二年十月，范仲淹因久無戰功，上奏仁宗自請貶降，並解除守邊之職，但不為仁宗所接受。見《長編》，卷 138，慶曆二年十月，頁 3312-3313。

韓琦與范仲淹於二月間共同上書，反對雙方進行和談。兩人認為，元昊在屢次取得軍事勝利後卻卑詞請和，動機十分可疑。希望朝廷暫緩進行和議，給予兩人三至五年的時間，兼用蕃兵與正軍之力進占橫山地區，最終可以「再定西陲」。在奏書中，兩人也針對和戎以省軍費的說法提出反駁，認為國家擁有的財賦本來就應該供應邊防之所需，不應只是為了節財而謀求罷兵議和。³²仲淹顯然放棄自己過去和戎以息民力的主張，反而以前代的名將自許，改採積極進取的作為，企圖徹底解決邊防的問題。

當時一批諫官亦群起反對議和，甚至彈劾主和的朝臣，來支持范仲淹的立場。³³歐陽修(1007-1072)在慶曆三年七月上奏說：

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爾。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皆善戰，蓋由我自謬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則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足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謬戰。此善算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
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³⁴

強調在范仲淹的主持之下，宋軍已然訓練整齊，能夠在戰場上扭轉過去的劣勢。既然不再畏懼敵人的入侵行動，就不必急於議和。另一方面，歐陽修主張對西夏強硬，亦是考慮到遼朝的因素。他早在慶曆二年五月上奏，論及遼使請求歸還關南地區之事時，就認為遼方的索地行動肇因於宋軍在陝西的一再失利：

³² 《長編》，卷 139，慶曆三年二月，頁 3348-3354。

³³ 包括王素、歐陽修、蔡襄、余靖與孫甫等人。主張和談的翰林侍讀學士楊偕因此而遭彈劾，於慶曆三年八月出知越州，見《長編》，卷 142，慶曆三年八月，頁 3424-3425。

³⁴ 《長編》，卷 142，慶曆三年七月，頁 3411。

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敕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³⁵

在歐陽修看來，既然軍事失利是引發外敵野心的原因，只有在戰場上積極求勝，才能嚇阻遼方的蠢動。可見，對西夏繼續用兵，爭取軍事上的優勢也是在當時面對遼人逼迫下的必要選擇。

不過，即使主戰的呼聲不小，且范仲淹和韓琦於慶曆三年四月被召入京城擔任樞密副使，能直接參與廷議，反對締和，整體局勢的發展仍不利於二人。³⁶遼方的使者要求宋廷與西夏締結和約，成為促使北宋君臣接受和議的重要因素。慶曆四年(1044)五月，韓琦與范仲淹在面見仁宗時，已承認必須接受元昊的請和條件，否則將同時引發遼、夏兩個政權的反彈，勢必無力應付。因此，兩人提出新的主張：「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在建立和平關係的同時，為日後的進擊預作安排。計畫的攻擊方式是爭取主動，以鄜延、環慶和涇原三路之兵輪流出擊，藉由逐步修築城寨，進占橫山地區。兩人強調：「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以橫山地區本在漢、唐版圖之中為由，宣稱主張進兵並非無故生事。³⁷

范仲淹與韓琦不僅對西夏問題提出詳盡的規劃，同時也考量遼軍在未來可能的入侵。兩人認為遼是中國長久以來的大敵，尤其在後晉

³⁵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 46，〈準詔言事上書〉，頁 650-651，參見《長編》，卷 136，慶曆二年五月，頁 3257。

³⁶ 范、韓兩人被召入京，見《長編》，卷 140，慶曆三年四月，頁 3363。韓琦在慶曆三年七月的廷議中曾獨力阻擋與元昊締和的主張成為最後的決策，見《長編》，卷 142，慶曆三年七月，頁 3408。

³⁷ 《長編》，卷 142，慶曆四年五月，頁 3597-3601。

時長驅直入，「為中原千古之恥」，必須小心防範。因此提出七項建議，最後一項是「密定討伐之謀」，顯示對於西、北二敵皆有出兵的打算。³⁸隨後樞密副使富弼進呈「河北守禦十二策」，除了詳細安排河北地區防務，更對一旦遼兵南侵，宋軍如何發動反擊，以乘機進占燕薊之地，提出細膩的規劃。富弼自信地說：「因其妄動，可以一舉而復全燕之地，拔數郡陷蕃之族，平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謂必無遺策矣。」³⁹充分顯示對於收復故土的期待之情。澶淵之盟後，執政大臣在奏疏中詳述取燕之策的，富弼實為第一人。

不過，由於范仲淹等人隨後在朝廷的政爭中失勢，他們提出的規劃，在仁宗時代就得不到實踐的機會。慶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富弼與宰相杜衍(978-1057)被政敵指為結黨營私、排斥異己，同時被罷職外放。唯一留任執政的韓琦，為扭轉不利的形勢，上書仁宗，主張委任范仲淹處理「西事」，對付西夏；以富弼負責「北事」，應付遼的威脅。這批主張改革的官員原本就靠著處理遼、夏問題而得到仁宗的信任，顯然仍企圖以相同的訴求來保持權勢。但是，仁宗既決定與遼、夏維持和平，已不再倚重范、韓等人。韓琦在訴求無效下，也在當年三月自請罷職，改任知揚州。⁴⁰失去參與朝政的機會，范、韓等人的主張無法影響朝廷的對外政策。

范仲淹對於進占橫山的主張不克實行，甚感懊惱，乃致力將此計畫宣揚於世，撰寫〈閱古堂〉詩就是方式之一。⁴¹「閱古堂」是韓琦

³⁸ 《長編》，卷 142，慶曆四年五月，頁 3601。

³⁹ 《長編》，卷 150，慶曆四年六月，頁 3649。

⁴⁰ 《長編》，卷 154，慶曆五年正月，頁 3740-3741；卷 155，慶曆五年三月，頁 3758-3759。

⁴¹ 據李清臣的記載：「會夏國送款，公謀不果用。范公每恨齟齬功不就，故作〈閱古堂〉詩叙其事，傳于世。」見李清臣，〈韓忠獻公琦行狀〉，收入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 48，頁 540。

於皇祐年間擔任知定州兼本路安撫使時修建。定州是河北國防重鎮，對防禦契丹南侵具有關鍵的影響力。有感於責任重大，韓琦修建「閱古堂」，繪畫前代名守良將的事蹟六十條於左、右壁，作為自己施政的典範；同時撰寫〈閱古堂〉詩與〈定州閱古堂記〉，闡揚為官之道在文事、武功並重，而皆本之於忠義的理念。⁴²為求張大其事，韓琦將撰寫的詩文寄贈好友，邀請范仲淹、富弼、文彥博(1006-1097)、歐陽修等人和詩同誌其事。⁴³看來韓琦既無法得志於朝廷，有意藉著與同道的詩文唱和，宣揚共同的政治主張。范仲淹在和詩中，先歌頌前代才兼文武的名臣張良和諸葛亮(181-234)，接著陳述韓琦與自己過去對抗西夏的成就，以及對於進占橫山的規劃：

僕思寶元初，叛羌弄千鐔。……中原因為辱，天子動宸襟。乃命公與僕，聯使禦外侵。歷歷革前弊，拳拳掃妖祲。二十四萬兵，撫之若青衿。……復我橫山疆，限爾長河潯。此得喉可扼，彼宜肉就槌。上前同定策，奸謀俄獻琛。梟巢不忍覆，異日生凶禽。僕已白髮翁，量力欲投簪。公方青春期，抱道當作霖。四夷氣須奪，百代病可鍼。河湟議始行，漢唐功必尋。復令千載下，景仰如高岑。因賦閱古篇，為公廊廟箴。⁴⁴

仲淹深信和議只是元昊的「奸謀」，西夏在未來必將進犯，只有復橫山故土，才能克敵制勝。但自己年事已高，距投簪辭官之日不遠，期待比自己年輕十九歲的韓琦在未來能實現進取橫山計畫，以漢、唐時期建立的軍功為典範，憑藉強大的武力壓制「四夷」，真正解決長期存在的外患，成為後世景仰的名臣。

42 韓琦，《安陽集》，卷1，〈閱古堂〉，頁9；卷21，〈定州閱古堂記〉，頁6-8。

43 參見李之亮、徐正英箋注，《安陽集編年箋注》，卷1，頁39-42。

44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3，〈閱古堂詩〉，頁63-64。

由於此詩蘊涵個人對國家未來前景的重大關懷，范仲淹親自以工整的小楷書寫，由韓琦於詩末題跋，再交給韓琦的妻舅崔公孺(1014-1071)模刻印刷。⁴⁵當模刻工作完成時，仲淹和仁宗均已過世，韓琦特別賦詩以記其事：

閱古堂成在北邊，希文詩筆美前賢。高吟尚紀終軍策，小字如觀樂毅篇。欲起貴名增世慕，更刊餘禮廣人傳。其他事業知難泯，盡入仁宗實錄編。⁴⁶

「終軍策」指漢武帝時代的終軍(d. 112 B.C.)，在奉命出使南越時，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⁴⁷「樂毅篇」指戰國名將樂毅，曾下齊國七十餘城。⁴⁸韓琦以此二人來比擬范仲淹的軍事成就及進擊拓土的主張。詩末指出刊刻此詩的主要目的，在於使世人廣知仲淹的事功與主張，可見范、韓二人對於宣揚進占橫山一事的重視。不僅如此，在仲淹身後，相關的墓誌、傳記和一些傳說都極力宣揚他的軍事成就與進討西夏的主張。例如富弼在仲淹的墓誌銘中說：

周公旋安集，坐可守禦，蓄銳觀釁，適圖進討。會羌人復修貢，朝廷姑議息兵而從其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閱武練將可以震敵，城要害、屬雜羌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過也。⁴⁹

⁴⁵ 崔公孺的生平見韓琦，《安陽集》，卷 49，〈故尚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頁 2-5。直到南宋晚期，劉克莊仍親見此詩的刻本，指仲淹「以一代元老大臣，而作蠅頭小楷，端謹如此。後有忠獻、忠定父子二跋，蓋本朝極盛時也。」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110，〈跋鄭子善通守諸帖·閱古堂詩刻〉，頁 2855。

⁴⁶ 韓琦，《安陽集》，卷 10，〈次韻和崔公孺國博模刻文正范公閱古堂詩〉，頁 4-5。

⁴⁷ 班固，《漢書》，卷 64 下，〈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頁 2821。

⁴⁸ 司馬遷，《史記》，卷 80，〈樂毅列傳〉，頁 2427-2429。

⁴⁹ 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收入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 12，頁 39。

按富弼所言，若非朝廷為求罷兵而接受西夏求和，范仲淹恐怕已實現進擊之策，成就「殄滅之功」了。張唐英(1029-1071)為范仲淹所寫的傳記，也說：「仲淹與韓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元昊大懼，稱臣。」⁵⁰將雙方和議的達成歸因於范、韓計畫協力進兵橫山，使西夏畏懼而稱臣請和。又如孔平仲在《談苑》中記載流行於邊區的傳說：

〔范〕仲淹與韓琦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聞而懼之，遂稱臣。⁵¹

同樣是誇大攻取橫山之謀造成的影響，形塑元昊畏懼范、韓二人軍事能力的印象。這些在當時流傳的說法，不僅宣揚進占橫山，即足以滅亡西夏的概念；同時給讀者一種印象：西夏是畏懼宋的武力才求和，而其未被消滅，只是因為范、韓的計畫未被實現。因此，儘管對西夏的作戰多次以慘敗收場，但這些誇大宋軍實力的說法廣泛流傳，導致讀書人對西夏心生輕視，到了神宗朝，部分文官提出取西夏甚易的看法，就不令人意外了。⁵²

另一方面，對夏戰爭所開啟的習兵風潮並未因議和的簽訂而消退。⁵³不僅兵學的相關論著持續刊行，民間的講學也重視軍事知識。

⁵⁰ 張唐英，〈范仲淹傳〉，收入《范文正公褒賢集》，卷1，頁827。

⁵¹ 孔平仲，《談苑》，卷3，頁326。

⁵² 王安石對神宗說取西夏「亦宜甚易」，不能實現的原因在於將帥不肯出力。見《長編》，卷232，熙寧五年四月，頁5632；主持元豐四年永樂之役的徐禧也是「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爾。」《宋史》，卷334，〈徐禧傳〉，頁10724；同樣參與永樂之役的宦官李舜舉，留下的遺奏是：「臣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敵。」反映出當時主政官員輕視西夏實力的現象。《長編》，卷329，元豐五年九月，頁7937。

⁵³ 關於西夏戰爭對宋代士人論兵風氣的影響，參見劉春霞，〈李元昊「僭號」與北宋中期文人談兵論析〉，頁195-197；王軍營〈北宋中期文人談兵風尚基本特徵初探〉，頁145-148。

仁宗朝最著名的教育家胡瑗(993-1059)在湖州講學，強調「經義」與「治事」並重。學生各依志向，選擇邊防、水利等實務來研習。因此，「好談兵戰者」得以聚居一處，相互講習切磋。⁵⁴習兵的目的在于實用，劉攽(1023-1089)的詩：「讀書當為王者師，論兵要作萬人將。」⁵⁵正說明了兵學研習的特殊性，必以統兵作戰為最終目的。因此，士人習兵的風潮持續發展，就容易在政壇上引發主戰聲浪。李覲(1009-1059)曾對此提出警告：「兵蓋不祥之器，學者未得其千一，而志意已壯。壯則思用，不用則聚而怨。」⁵⁶顯然，喜好談兵的士人為一展所學，不免傾向藉武力解決對外問題。由此可知，儘管慶曆和議的達成，象徵宋的對外政策又回到和戎弭兵的老路，但復漢唐舊土的呼聲發展成形，加上佔領橫山足以克制西夏的理念流行，使得主戰的意見繼續蘊釀。

四、邊境糾紛與拓邊理念的落實

對北宋朝廷而言，和戎最主要目的在於避免戰爭，一旦在現實上無法藉由安撫以維繫和平，和議政策就會受到質疑。慶曆議和之後，宋與遼的關係尚稱穩定，對遼用兵的意見雖繼續被提出，並未產生實質的影響。⁵⁷但在西部邊境，情勢仍不平靜，西夏部隊持續進犯，南方又有新的衝突發生。邊境糾紛在仁宗朝後期與英宗時代不斷發生，顯示和戎政策不足為恃，也使得拓邊論者關注的目標由西北擴展到南方，最後形成神宗朝南、西雙向的拓邊行動。

⁵⁴ 朱熹、李幼武編，《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 10，〈胡瑗〉，頁 335、339。

⁵⁵ 劉攽，《彭城集》，卷 7，〈送原甫帥永興〉，頁 12。

⁵⁶ 李覲，《李覲集》，卷 22，〈慶曆民言三十篇·儲將〉，頁 254。

⁵⁷ 在仁宗朝末年提出收復幽燕主張的官員是郭諮。他原為文官，後來轉任武職，於嘉祐五年上〈平燕議〉。參見《長編》，卷 191，嘉祐五年五月，頁 4622-4624。

正當宋廷與元昊進行和議之時，西南邊區爆發了新的軍事衝突。慶曆四年二月，原受廣西路羈縻的蠻族區希範起兵，范仲淹等執政大臣推薦當時備受重用的文臣杜杞(1005-1050)處理此事。⁵⁸次年，杜杞領兵進擊，區希範及同黨戰敗投降，盡為杜杞所殺。杜杞致書友人，自比於東漢名將馬援(d. 49)，並說：「此不足以為吾功，力能辦西、北，顧未得施耳。」⁵⁹顯然有意追求像漢代一樣的顯赫軍功，不以平定小小的蠻亂為滿足。因此，杜杞將南方最具實力的交趾政權當成下一個目標，他上奏朝廷，詳述交趾的歷史沿革、地理形勢及兵、民狀況，並擬訂攻取之計。但是，當時朝廷甫與西夏議和，無意與交趾為敵，這份奏疏就被留存於樞密院的檔案中，未被落實。⁶⁰不過，宋廷為避免與交趾衝突，採行「不納交趾逃民」的政策，卻在皇祐四年(1052)引發了廣源州蠻族領袖儂智高的叛亂。⁶¹

儂智高之亂前後歷時兩年，對嶺南地區造成極大的傷害，促使時人更加重視嶺南的邊務。部分地方官因而加強荒地的開發，並積極招納沿邊的部族，引發宋與交趾間關係的緊張。⁶²在此情況下，進攻交趾的主張再由知邕州蕭注(1013-1073)提出。蕭注雖為進士出身的文官，卻好言兵事。儂智高率兵包圍廣州時，他正權攝番禺令，募兵反擊，

58 《長編》，卷 148，慶曆四年四月，頁 3578。杜杞受知於范仲淹、富弼，在慶曆三、四年間備受重用，余靖因而批評：「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之狹也。」相關史料參見《范文正公文集》，卷 11，〈祭杜待制文〉，頁 280；蘇軾，《蘇軾文集》，卷 18，〈富鄭公神道碑〉，頁 536；《長編》，卷 148，慶曆四年四月，頁 3579。

59 《長編》，卷 155，慶曆五年三月，頁 3760；司馬光，《涑水記聞》，卷 4，〈杜杞誘殺宜州蠻〉，頁 74。

60 《長編》，卷 217，熙寧三年十一月，頁 5285-5286。

61 北宋的交趾政策與儂智高起兵的關連性，可參見呂士朋，〈宋代之中越關係〉，頁 101-103；湯佩津，〈北宋真、仁宗時期對交趾的政策〉，頁 84-86。

62 參見湯佩津，《北宋的南邊政策——以交趾為中心》，頁 118-121。

立下戰功，朝廷命他改換武官，進而成為負責廣西政務與防務的重要官員。⁶³他在治理邕州期間，致力連絡沿邊各部族，企圖利用這些力量攻取交趾。嘉祐四年(1059)，他以交趾多年來逐步蠶食宋的疆土為由，請求朝廷接納他的出兵主張，但不為朝議所接受。⁶⁴次年，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李師中(1013-1078)藉故彈劾蕭注，並牽連支持蕭注主張的廣西經略使蕭固(1002-1066)、轉運使宋咸，導致三人同時罷職，南征交趾的提議遂告中挫。⁶⁵

嘉祐年間的主政者主要是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當仁宗在嘉祐八年(1063)辭世後，韓琦等人冊立英宗(1032-1067，1063-1067在位)，繼續在治平年間執政。這批在慶曆年間力主內政改革及對西夏強硬的官員，在十多年後再次取得參政之權，作風有了很大改變，力求持重。⁶⁶不接受蕭注等人的建議，避免在南方生事，正反映了這種政治傾向。但是，西夏騷擾邊境的問題，卻促使他們提出強硬的對策。嘉祐年間，西夏在邊境上的侵擾日益加劇，與宋軍屢次爆發軍事衝突與外交爭議。⁶⁷到英宗治平元年(1064)秋天，夏兵騷擾秦鳳、涇原二路，宋廷的主戰聲浪開始浮現。⁶⁸同平章事韓琦重提慶曆四年進占橫山之議，參知政事歐陽修則認為攻取橫山的計畫不夠全面，並對二府執政們一直不能擬定對策深感不滿。他在治平二年(1065)正月上奏，力主諒祚必叛，宋軍應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目標是：「係繫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敵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

⁶³ 《宋史》，卷 334，〈蕭注傳〉，頁 10723-10733。

⁶⁴ 《長編》，卷 190，嘉祐四年九月，頁 4593。

⁶⁵ 《長編》，卷 192，嘉祐五年十一月，頁 4647；卷 193，嘉祐六年四月，頁 4664-4665；《宋史》，卷 332，〈李師中傳〉，頁 10677-10678。

⁶⁶ 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頁 224-225。

⁶⁷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62-65。

⁶⁸ 《長編》，卷 202，治平元年九月，頁 4905-4906。

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⁶⁹寄望以武力一舉消滅西夏政權，若不成功，也希冀能取得橫山一帶，建立穩固的防線。

以武力拓邊，收復故土的主張雖由執政者提出，但因英宗即位後，朝廷、宮廷都陷入嚴重的政治鬥爭中，執政大臣彼此不合，又忙於應付諫官的攻擊，自然無暇對外。⁷⁰另一方面，英宗本人並不傾向在邊境生事。治平三年(1066)正月，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997-1066)去世，英宗以知桂州陸詵(1022-1070)繼任，在召見過程中，君臣間有對話如下：

丁亥，免陸詵正銜，令入見。上勞問之曰：「卿嶺外處畫無不當者，鄜延最當敵道，故選用卿，今將何施為。」詵曰：「邊事難以遙度，抑未審陛下意務在安靜或欲示威也？」上曰：「大抵邊陲宜以安靜為務。昨見王素言朝廷與帥臣常欲無事，自餘將校無不欲生事要功者，卿謂此言如何？」詵曰：「素所言是也，陛下能責任將帥，令疆場無事，即天下幸甚！」上稱善，勉之。⁷¹

可見，當時安撫與主戰的意見紛陳，以致陸詵必須詢問英宗的意向，作為未來行事的依據。從英宗的話看來，主要的目標在於避免生事，並無意將主戰聲浪付諸實踐。陸詵則認同知定州王素(1007-1073)所言，認為邊境上的武官多主張進擊以求戰功，各路的安撫使則不願意挑起事端，朝廷只要信任安撫使，邊境即可無事。事實上，此種說法與當時的狀況頗有出入，因為陸詵的前任程戡就力主出兵進擊。

對部分陝西的官員而言，當時橫山一帶的部族因不滿諒祚的統治，要求宋方出兵相助，共同攻擊靈州，正提供了前所未見的進兵良機。安撫使程戡就力主「豺虎非其相搏，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當誅，宜乘此聽許。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

⁶⁹ 《長編》，卷 204，治平二年正月，頁 4935-4941。

⁷⁰ 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頁 231-238。

⁷¹ 《長編》，卷 208，治平三年六月，頁 5054。

國之利也。」⁷²他的提議雖未能實現，但當地官員持相同的看法者不在少數。繼程戡擔任安撫使的陸詵雖企圖避免生事，卻無法改變其同僚的作法。例如：駐守青澗城的武官种諤，自治平二年上任後，即努力交結橫山的部族。⁷³這樣的作法得到陝西轉運使薛向的支持，他上奏英宗，力主離間西夏君臣，進行招納。⁷⁴由此可見，從中央到地方，對西夏用兵的計畫已蘊釀多時，只是一直未能得到君主的首肯。治平四年(1067)正月，神宗即位，終於使主戰官員得到了期盼已久的奧援。當年七月，薛向等人招納橫山豪酋嵬名山的提議在神宗的允許下秘密進行，開啟了神宗朝拓邊事業的先河。⁷⁵

治平四年十月，种諤出兵招降嵬名山，並進占綏州城，引爆了宋、夏間的戰鬥。次月，神宗任命韓琦為陝西經略使，總領五路軍政以應付危機。但邊臣各自為政的情況令韓琦感到困擾，他在赴任前上奏說：

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一帶蕃族，今种諤已擅據綏州，啓此釁端。朝廷急遣向往，至則主諤謀，遂檄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老幼，豈招誘邪？涇原蔡挺又欲合環州兵直趨興、靈，即是諸路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算。⁷⁶

可見當時諸路邊臣不僅各自出兵進占橫山一帶，涇原路經略安撫使蔡挺(1014-1079)又有直取靈州的提議。看來在神宗同意薛向的建議後，長

⁷² 《長編》，卷 207，治平三年正月，頁 5021。

⁷³ 趙起，《种太尉傳》，頁 1。

⁷⁴ 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篇紀事本末》，卷 83，〈种諤城綏州〉，頁 1-2。

⁷⁵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73-74。

⁷⁶ 韓忠彥，《忠獻韓魏王家傳》，收入韓琦，《安陽集》，卷 7，頁 1；參見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篇紀事本末》，卷 83，〈种諤城綏州〉，頁 5-6。

期得不到朝廷支持的主戰官員大受激勵，紛紛提出自己的進擊計畫，反而造成宋軍的行動陷入混亂。

在進占橫山與直取靈州兩項計畫之外，王韶(1030-1081)也在熙寧元年(1068)上〈平戎策〉，主張開拓河湟，從側翼包夾。⁷⁷神宗一朝對西夏用兵，皆不脫這三個範疇。熙寧三年(1070)韓絳(1012-1088)攻囉兀城與元豐五年(1082)徐禧(1035-1082)築永樂城，都是為佔領橫山一帶；元豐四年(1081)五路出兵伐夏，則是企圖直取靈州。經略河湟的計畫，在熙寧年間局部實現，以新得之地設立熙河路，成為元豐年間出兵伐夏的基地，神宗臨死之前尚在規劃由此路襲取靈州。⁷⁸事實上，神宗時代進行的三種伐夏方案，都是在仁宗朝就已構思成形。攻取橫山及直取靈州早在慶曆年間即有官員提出，進占河湟之議也是在仁宗時期流傳於關中士人群中，後來王韶據以提出〈平戎策〉。⁷⁹值得注意的是，向神宗提出拓邊建議的官員如薛向、蔡挺、王韶、韓絳、徐禧等人都是文臣，只有种諤是武官。⁸⁰相對地，部分陝西地區的資深將領並不支持拓境，例如：鄜延路副都總管賈逵(1010-1078)曾在神宗即位之初，上書批評种諤為貪圖一己之功，在邊境上生事。⁸¹鄜延路經略安撫使郭逵(1022-1088)則在熙寧三年反對宣撫使韓絳聽信种諤攻取橫山的計畫，對韓絳說：「諤，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

⁷⁷ 彭百川，《太平治蹟統類》，卷 16，〈神宗開熙河〉，頁 1211-1215。

⁷⁸ 相關戰役的經過參見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176-193。

⁷⁹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 13，頁 144。

⁸⁰ 相關人物的傳記參見《宋史》，卷 328，〈薛向傳〉，頁 10585-10588；卷 328，〈蔡挺傳〉，頁 10575-10577；卷 328，〈王韶傳〉，頁 10579-10582；卷 315，〈韓絳傳〉，頁 10301-10304；卷 334，〈徐禧傳〉，頁 10721-10724；卷 335，〈种諤傳〉，頁 10745-10748。

⁸¹ 參見何冠環，〈狄青(1008-1057)麾下兩虎將——張玉(?-1075)與賈逵(1010-1078)〉，頁 365-366。

必此人也。」因而被朝廷調離陝西。⁸²

西向拓邊的工作多由文臣主持，且根基於仁宗時代的構想，在边疆議題上亦復如此。熙寧三年，神宗開始注意到交趾的議題，翰林學士承旨王珪(1019-1085)乃上呈杜杞於慶曆年間擬訂的攻取交趾計畫，神宗閱讀後，交付參知政事王安石(1021-1086)參考。⁸³兩個月後，神宗即任命曾提議攻交趾的蕭注為知桂州，並當面詢問攻取之策，但蕭注的態度轉趨保守。由於距當初的提議已有十五年之久，時空條件改變，過去訓練的溪洞之兵已不復存在，且交趾的實力增強，也非昔日可比。⁸⁴因此，蕭注在上任後，並不積極規劃進攻交趾。熙寧六年，刑部郎中沈起(1017-1088)進言「交州小醜，無不可取之理」，神宗乃以沈起取代蕭注。⁸⁵沈起「生平喜言兵，嘗以兵說于范文正公，文正器其才，期有所施用。」⁸⁶既曾因兵學得到范仲淹的期許，乃希望在南方一試身手。沈起上任後採取的作法，仍與蕭注在嘉祐年間的策略相同，交結、組織溪洞之兵，並招納不服交趾管轄的部族，這些具有侵略意圖的施政，最終引發交趾在熙寧八年(1075)興兵侵宋。⁸⁷

神宗朝的主戰官員不僅在具體作法上繼承前人，在宣揚拓境主張時也同樣以復漢、唐故土為號召。例如：王韶的〈平戎策〉一開始就說：「古者禦戎無上策，調戎狄荒忽，在要服之外也。今河西李氏據兩路，皆漢、唐舊郡，在邦域之中，所謂癰疽伏疹，留滯脅下，心腹之患也。」⁸⁸以西夏所據之地為漢唐故土為由，力主不應將其視為夷

⁸² 《長編》，卷 217，熙寧三年十一月，頁 5283。

⁸³ 《長編》，卷 217，熙寧三年十一月，頁 5285-5286。

⁸⁴ 《長編》，卷 219，熙寧四年正月，頁 5324。

⁸⁵ 《長編》，卷 242，熙寧六年二月，頁 5905。

⁸⁶ 沈括，《長興集》，卷 18，〈故天章閣待制沈興宗墓誌銘〉，頁 138。

⁸⁷ 《宋史》，卷 334，〈沈起傳〉，頁 10728。

⁸⁸ 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卷 16，〈神宗開熙河〉，頁 1212。

狄而置之度外，必須積極攻取，以避免日後為患。元豐四年，環慶路經略安撫使俞充(1033-1081)也在請求伐夏的奏書中說：

臣平時守邊，惟慕羊祜；及其伐國，志為李靖而已。經營於此，已三年矣。策求萬全，一舉而就。恢復漢、唐兩河之地，雪寶元、康定之恥，以成國家萬世之利，其費不過五年歲賜秉常之數，其歷日亦不久。⁸⁹

俞充以羊祜(221-278)與李靖自比，認為討伐西夏是收復漢、唐舊土，可以一雪過去戰敗之恥，永久解決邊患，可見前朝的典範對他有很大吸引力。神宗討論邊事，同樣以唐代的前例為鑑。當他得到交趾上表指稱征伐占城大捷時，下詔知桂州潘夙：

神宗詔之曰：「智高之難，方二十年。中人之情，燕安忽事，直謂山僻蠻獠，無可慮之理。殊不思禍生於所忽，唐六詔為中國患，此前事之師也。卿本將家子，寄要藩，宜體朕意，悉心經度。」夙遂上書陳交趾可取狀，且將發兵。⁹⁰

舉仁宗朝儂智高及唐代六詔為患的前例，認為交趾的威脅不容忽視。潘夙雖為文臣，卻是宋初大將潘美(921-987)的從孫，⁹¹故神宗稱他是「將家子」，要他盡力處理此事，頗有暗示潘夙動武之意。無怪潘夙在得到詔書後，即上奏主張攻取交趾。

由此可知，自仁宗朝以來，「復漢唐舊土」成為政治論述中極具影響力的主張。即使素來反對用兵的官員，仍可能提及此一理念。例如：司馬光是北宋中期極具代表性的反戰論者，對神宗拓境之舉多所批判，並在元祐初年推動歸還西夏失地以謀求和議的政策。⁹²但是，

89 《長編》，卷 313，元豐四年六月，頁 7585。

90 《宋史》，卷 333，〈潘夙傳〉，頁 10718。

91 《宋史》，卷 333，〈潘夙傳〉，頁 10717

92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頁 83-89；Xiao-bin Ji, *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他在治平二年六月，上書批評邊臣為了遼人越界捕魚等小事與對方發生衝突，主張對於遼人在邊界的侵擾，不應以武力相抗，只能透過外交方式加以解決。但若對方一再不聽，唯一的對策是：

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漠北，復漢、唐之土宇，其與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⁹³

由此看來，司馬光承認最終解決宋、遼爭議的方式是復漢唐之故土，只是目前無法達成，只能採取和平退讓的作法，勿因小事開戰。同年十二月，司馬光上書英宗，要求重視西夏的潛在威脅，致力拔擢軍事人才，加強練兵。強調只要能持續推行這些工作：

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雖北取幽薊，西收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為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略，制戎狄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⁹⁴

也就是說，只要致力於軍政改革，使宋軍擁有強大的戰力，即使君主想要攻取契丹、西夏亦非難事。他在治平四年反對招納嵬名山的兩篇奏書中，同樣強調當前國力不足，應避免開啟邊釁。但只要能在修內政、練士卒等事項有所成就，則「復靈夏，取瓜沙，收蔚朔，無不可也」。⁹⁵前輩學者早已言及司馬光曾寫下「何必燕然刻，蒼生肝腦塗」的詩句，表達對漢代征伐外夷一事的批判。⁹⁶他執政時力主歸還神宗

Northern Song China : 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Sima Guang (A.D.1019-1086), pp. 57-58, 178.

⁹³ 《長編》，卷 205，治平二年六月，頁 4970。

⁹⁴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卷 33，〈西邊劄子〉，頁 282。

⁹⁵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卷 38，〈橫山疏〉、〈橫山上殿劄子〉，頁 312、313。

⁹⁶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卷 7，〈送二同年使北〉，頁 106；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頁 199。

拓邊所得之西夏疆土，倡言：「新開數寨，皆是彼田」，顯然不認為西夏所據之地本是中國舊土。⁹⁷因此，司馬光提及恢復漢唐舊境，可能只是高舉的一個理想，吸引君主重視自己的建議，他真正認同的政策應該是「守今日之封略，制戎狄之侵侮」。然而，他反覆提及復漢、唐故土，等於承認主戰派「北取幽薊，西收銀夏」訴求的合理性，並將漢、唐兩代與外夷之間的關係視為典範。形成了在現實上反對用兵，卻肯定主戰派「復漢唐故土」理念的矛盾現象。

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韓琦的身上。他在熙寧八年上奏神宗，以強烈的措詞批判拓邊戰爭，指責主其事者全為貪圖私利，不顧國家安危的小人。但同時又說：「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⁹⁸仍將收復故土視為崇高的理想與奮鬥的目標，形同鼓舞神宗藉由拓境來建立自己歷史地位的野心。因此，神宗朝的反戰官員雖一再以內政未修、人民未安、財力未豐、兵力不足等理由，企圖說服君主停止用兵，但由於無法在理念上提出反制「復漢唐舊土」的論述，不能說服神宗放棄仿效唐太宗的理想，也就難以改變其積極拓邊的政策。⁹⁹另一方面，韓琦與富弼原本是「復漢唐舊土」的倡議者，在熙寧年間卻成為反戰派的代表人物，顯示拓邊策略雖然淵源於慶曆年間改革派官僚的理念，但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內容變得多元而複雜，一旦付諸實踐，所產生的影響和結果，已不是當初倡議者所能控制。

⁹⁷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卷33，〈西邊劄子〉，頁282；參見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頁131。

⁹⁸ 韓琦，〈上神宗答詔問北邊事宜〉，收入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137，頁1543。

⁹⁹ 對神宗志在效法唐太宗的討論，參見東一夫，《王安石新法の研究》，頁104-105；張元，〈從王安石的先王觀念看他與宋神宗的關係〉，頁273-300。

五、結論

透過分析真宗至神宗時期的宋代文士的論著，可以發現北宋對外政策的轉變是經過長期的蘊釀，才在神宗即位後付諸實現。主要的原因在於，澶淵之盟所帶來的承平，並未使士人放棄對軍功的嚮往；主政者雖然不再提倡恢復漢、唐舊疆，但割讓幽、薊為「中原百年之恥」的遺憾仍令讀書人難忘。因此，在真、仁之際，即使邊境寧靜無事，部分文士與文官仍透過上書朝廷和撰述兵書，呼籲執政者重視軍事。等到西夏戰爭爆發，討論邊防與研習兵書更蔚為風潮，促使文官、士人重新檢討以和戎為中心的對外政策。即使宋廷終因迫於遼、夏的雙重壓力，在慶曆四年罷兵議和，范仲淹與韓琦仍在同一時間以橫山之地為漢、唐舊疆為由，規劃未來進擊的行動。此一計畫雖未能在仁宗朝實現，但范、韓及同道致力宣揚，加上士人談兵之風助長主戰的傾向，成為拓邊主張持續發展的內在因素。

另一方面，慶曆議和並未達到預期的成果，西部邊境持續爆發衝突，嶺南地區也產生新的軍事威脅，為積極進取主張的發展提供外在環境。在「復漢唐舊境」的理想與現實軍事危機的交互影響下，各種拓境的策略自仁宗朝晚期陸續由邊區守臣與朝中執政提出，且倡議者多為文官，與宋初武官傾向主戰，文臣多半主和的狀況有明顯的不同。至神宗即位，這些主戰的提議終因得到君主的支持而逐步付諸實現。由此可見，北宋對外政策的轉變並非僅出於皇帝個人的意志，而是在文官群中長期蘊釀的結果，擁有豐富的理想與政策內涵作為基礎，一旦啟動即不易停止。對於持反戰立場的官員而言，所面臨的處境變得相當艱苦。和戎政策既不能發揮預期的效果，也無適當的訴求改變君主「復漢唐舊土」的野心，致使主戰言論始終影響北宋晚期對

外的政策走向。

現代學者對於宋初弭兵論的研究，往往使人以為弭兵反戰是北宋文士思想的主流，事實上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北宋與外族締結和約，以金錢維持和平，是處理夷、夏關係上的新發展。但是，漢、唐時代以武力拓境，威加四夷的作法，被許多宋代文士視為解決邊患的不二法門，導致現實處境與理想狀態之間存有巨大的落差。自仁宗朝以降，收復漢、唐故土的合理性鮮少被質疑，受此觀念影響，部分文士、文官懷抱著追求軍功的熱情，即使受限於現實環境，只有部分得到落實，但仍成為引導北宋對外政策由和轉戰的主要力量。

(本文於 2012 年 9 月 13 日收稿；2012 年 11 月 28 日通過刊登)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孔平仲，《談苑》，收入《全宋筆記》，第二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 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四部叢刊本。
- 司馬光，《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朱熹、李幼武，《五朝名臣言行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影印宋刊本。
- 沈括，《長興集》，收入《沈括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 李觀，《李觀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
-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收入《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
- 范仲淹，《范文正公褒賢集》，收入《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
-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 張方平，《樂全先生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宋刻本。
- 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
- 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篇紀事本末》，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影印宛委別藏本。
- 彭百川，《太平治蹟統類》，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影印校玉玲瓏閣鈔本。
- 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9。
- 趙起撰，《种太尉傳》，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據穴硯齋鈔本。
-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
- 劉攽，《彭城集》，臺北：臺灣商務，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劉敞，《公是集》，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傳增湘校清光緒覆刻聚珍本。
-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韓琦撰，《安陽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正德九年張士隆刻本。

蘇舜欽，《蘇舜欽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二、近人論著

王明蓀，〈宋初的反戰論〉，收入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戰爭與中國社會之變動》，臺北：淡江大學，1991，頁 37-52。

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增訂本。

王軍營，〈北宋中期文人談兵風尚基本特徵初探〉，《船山學刊》，2011：3(長沙，2011)，頁 145-148。

伍伯常，〈北宋初年的北方文士與豪俠——以柳開的事功及作風形象為中心〉，《清華學報》，36：2(新竹，2006)，頁 295-344。

呂士朋，〈宋代之中越關係〉，《東海學報》，1981：22(臺中，1981)，頁 94-117。

李之亮、徐正英箋注，《安陽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何冠環，《北宋武將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3。

東一夫，《王安石新法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70。

張元，〈從王安石的先王觀看他與宋神宗的關係〉，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 23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88，頁 273-300。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

陳芳明，〈宋初弭兵論的檢討(960-1004)〉，《國立編譯館館刊》，4：2(臺北，1975)，頁 47-64。

陳峰，《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陳峰，〈宋代主流意識支配下的戰爭觀〉，《歷史研究》，2009：2(北京，2009)，頁 38-50。

陳植鏗，《石介事跡著作編年》，北京：中華書局，2003。

湯佩津，《北宋的南邊政策—以交趾為中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湯佩津，〈北宋真、仁宗時期對交趾的政策〉，《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006：

38(臺北, 2006), 頁 75-118。

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6。

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曾瑞龍,《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香港:中華書局,2010。

黃寬重,〈北宋晚期對廣西的經略——以程節、程鄰父子為中心的討論〉,《法國漢學》,第12輯,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208-225。

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臺北:稻鄉出版社,1994。

劉春霞,〈李元昊「僭號」與北宋中期文人談兵論析〉,《蘭州學刊》,2008:11(蘭州,2008),頁195-197。

Fang, Cheng-Hua.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 875-1063)*.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09.

Ji, Xiao-bin. *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Sima Guang (A.D.1019-1086)*.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Smith, Paul J. "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 (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 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s, 1068-1126," in Patricia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2006, pp. 78-130.

From Diplomatic Pacification to Territorial Expansion: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Northern Song

Cheng-Hua F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odern historians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 Song court reached peaceful agreements with their two primary rival regimes—the Khitan and the Tangut. They generally argue that the main factor producing this result was the anti-military inclination of Song civil officials. This historical explanation coincides with a traditional concept that the Song dynasty was a monarchy that fostered the civil side of government over the military. After Emperor Shenzong inherited the throne in 1067, however, the situation significantly changed. Adopting aggressive policies, Shenzong launched a series of expeditions to the western and southern frontiers. Although the death of Shenzong temporarily stopped military actions, Emperor Zhezong renewed war against the Tangut after h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 court, and his successor Emperor Huizong continued this aggressive policy. Military expeditions inspired huge debates in the court,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actors causing the Song leaders to adopt aggressive polici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writings of literati. Although living in relatively peaceful conditions, some literati in the early Renzong period were alarmed over the potential crisis in the frontiers. Later, the Tangut war (1038-1044) further caused civil elites to engage in military learning and army command. To solve the military threat, certain leading bureaucrats, such as Fan Zhongyan and Han Qi, sought to recapture the previous territories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which later justified the expansion policy. In the Renzong and Yingzong periods, some officials continued to submit proposals to conquer the Tangut and Vietnam, but these failed to be approved by the court. The ascent of Emperor Shenzong in 1067 eventually provided the support which bellicose officials needed, and started a series of military actions. Thus, the interest of civil officials in military expansion was a crucial factor producing the change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Keywords: territorial expansion, Song Shenzong, bellicosity, foreign policy, Fan Zhongyan, Han Qi